

《晋书·陶潜传》中，开篇这样介绍陶渊明：“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也就是说，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到大司马，可谓东晋顶尖权臣，所以陶渊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宦世家子弟，出身绝算不上差。但是，他却仕途不顺，半生困苦，一点没有陶侃手握荆江二州，同“江左夷吾”王导叫板的意气风发。

要说才华，陶渊明绝对不缺；官场人脉，也勉强有些。论起点，比曾祖高出一大截，为什么他却没能成为陶氏家族第二个陶侃呢？光用“性情恬淡”这个理由解释不通。陶渊明在《杂诗》中有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说明他在少年时，是欲有一番作为的。发现自己日渐衰老，却终日沉湎于杯中物而一无所成时，也曾作《荣木》来表达自己仍然还有建功立业的追求：“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陶渊明最终没有成为像曾祖陶侃那样影响整个南朝时局、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陶渊明滤酒图

辞职的结果就是无法脱贫。晋安帝隆安二年，陶渊明入桓玄幕任职。当然，陶渊明并不只是因为家中无米下锅，就随随便便挑了一个位置混日子拿工资。从他挑选桓玄作为自己的效力对象可知，他的内心深处是有欲整顿东晋朝堂纲纪的愿望的。他也曾在家书《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如果长官无法让他欣赏认同的话，他还是宁愿在家辛苦种田吧。

但是，在他辞去职务回家守丧没多久，桓玄和安帝的矛盾冲突加剧，率兵攻入建康篡晋自立。按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书中所言，陶渊明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无法得知（他回家守丧因此避免了尴尬），但他的确接受了桓玄的敌对势力、北府刘裕的招揽，做了镇军参军。这足以说明了他对旧主桓玄的厌弃和对表面上看似挽救了晋朝危局的刘裕的支持。

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陶渊明与陶侃的相似性，即《晋书》中对陶侃之“贞固”的评价。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陶侃面对已名存实亡的中央政权，仍然坚守自己的政治底线，只因陶臻的叛逃而不得不选择归附于司马睿，也造成了陶侃在东晋初年一度被打压的局面。而陶渊明在面对桓玄篡位的消息后，选择效忠看似在维系正统的刘裕，可能也有受到祖先影响的成分在。

不过，曾祖孙二人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陶侃虽然一度遭到当权者打压，但当时已成为平衡时局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最终还是熬倒了司马睿和王敦，成功跻身东晋权力顶峰。而陶渊明作为一个文人，就没有那样的重要性了，在以军事能力为主的刘裕帐中，大概就是一个不太能被看顺眼的桓玄“旧臣”吧。

这次陶渊明的参军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左右就结束了。回家种地却填不饱肚子，再次出仕又不想去和刘裕瞎折腾，咋办？跟亲朋好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想找个不太累，能让我每天喝喝酒唱唱歌的那种工作，混日子吧。

后面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范出处了。这次只做了小小的彭泽令的他，还没有等到公田里酿酒和吃饭的粮食收获，就一怒之下辞了官。这下彻底对官场死了心的陶渊明，宁愿贫苦一生也不想再出仕了。

据袁行霈先生分析，陶渊明在官场上仍有一定人脉，如果他还愿意出山为刘宋王朝效力，道路是畅通的。比如王导的曾孙王弘就很敬仰他，在任江州刺史时，“尝以酒馈陶渊明”。再比如太尉参军殷晋安与始安太守颜延之，都与陶渊明交情甚笃，陶渊明去世后颜还为其作《陶徵士诔》。由此可见，陶渊明随后的归隐，和受到排挤迫害的关系不大，个人因素占据了主要方面，即仕宦生活实在不符合他的性格。其《归去来兮辞》中，“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便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

陶潜为何没能成为陶侃第二？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陶渊明与曾祖陶侃有着相似的境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比陶侃在士族中的名声还要更好，却为什么没有取得其曾祖的成就呢？

首先，他们面临的政治环境是不同的。西晋末年，孙吴之地兵乱刚刚平息，时人尤

其是南北世家大族间，普遍没有相互认同感。北地士族以其居中原正统为名，自来看不起南方士族。但是，从晋室南迁开始，北方士族渡江挤压南方士族利益，双方矛盾激化严重。王导为平衡东晋朝局，不得不实行“宽简”之政，向南方士族团体释放善意。

陶侃虽然只是庶族寒门，但其在晋室大乱中依凭军功而起，手握荆州（还曾控制江州），为一地方伯。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荆州一度为其所控，其他人即使坐上荆州刺史的位置也没法长久。因此，重用陶侃不失为向南方团体示好的一个好方法。同时，随着晋元帝的去世，王导和庾亮展开了长期交锋，需要一个非北方士族团体的人来平衡时局，而权重势威却无士族根基的陶侃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陶侃也因其出身和与王导、庾亮的矛盾而止步于方伯，无法位进中枢，家族也在其去世后逐渐没落。

陶渊明面临的政治形势迥然不同。经过近百年的经营，侨人势力巩固，已不需要拉拢和他们争抢既得利益的南方士族团体，因此即使陶渊明“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符合士族团体一贯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被时人所推崇，却也并不能从其南人的身份中获得政治上的便利。

桓温、刘裕相继掌握着东晋末年朝中两股最大的军事力量，即荆州和北府军。本来陶渊明的出身非常适合效力于荆州幕中，奈何桓温死后，桓玄在决策上产生了重大失误，导致荆州一败涂地，北府刘裕坐大。陶渊明在刘裕幕中为官的过程中，也看清了刘裕并不是值得效力的对象，加上晋末政坛波云诡谲，没有军权傍身、没有庞大家族势力的陶渊明只能选择急流勇退。